

《录取通知书》触发的“上书院”“分状元糕”等回忆

■宋维远



夏辞秋届，阳光带着喜气，将一张张饱含对未来人生憧憬的《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千家万户的准大学生及其家长们手中。父老们的思绪随之被触发，纷纷晒出自己少年时亲历亲见的诸如“上书院”“分状元糕”“拜老师”等故事，不但自讲自乐，也逗得旁听的大人、小孩们兴趣盎然。

读书、戴顶、进学、补廪

“读书、戴顶、进学、补廪”这四个词说的是清以前学童从蒙学到进县学的过程。自古至今，我国普通人家的幼童在六七岁时，父母总是千方百计地设法令其读书识字，知礼成才。“古之学者必有师”，幼童读书，必先进书院、拜师。“书院”是民间对所有学堂的统称，它的别名很多，如“塾”“庠”“序”“学”等。“家有‘塾’（家族办的书塾），党（500家为党）有‘庠’，术（通遂，25党为遂）有‘序’，国（诸侯封国）有‘学’（国子学）”（《礼记·学记》）。“塾”是等级、规模最低的“蒙学”（发蒙初始学习的学校）。瑞安人说的“上书院”指的大都是幼童开始读书的家塾，“书院”却是指宋朝以后规模、等级高、名师讲学的非官办学校，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上书院”相当于现在说的“上学”，“上”字还是书面语呢。

第一天读书，又相当于现今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开学典礼”，是学童们一生的大事，家庭长辈、亲朋好友，都要送礼庆贺，书塾举行拜师仪式。我国古今对老师都是非常尊重的，认为“天地君亲师为大”。按不同家庭经济条件，“上书院”的仪式也有不同，最基本的一般都会由家长陪学童带一块“红毡”（跪垫）和一包“状元糕”到书塾，先向老师叩头跪拜。然后把“状元糕”（就

是普通的米糕，希望读好书，将来中状元，取个好名字，“糕”，又谐音“高”，寓意：读书步步高升，不断进步）分给书友（同学）们吃，互相祝贺。然后老师引领学童朗读：“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等课文。初发蒙的当然不懂，只是跟着学，老学童则不但会背，还晓得学童要终生努力学习的道理，使自己成器、成才。

“戴（方言读如“带”）顶”的顶，指帽子。学童入塾后，帽子的规格变了。可以戴上有帽顶（即在原来婴孩的帽子上面用绳子抽紧后留出直径小半寸的圆孔上缝上一个用红布包扎枣核的小圆球，称“顶”，表示与没有上学的儿童的區別，也暗示将来做官时“乌纱帽”“红缨帽”，统称“顶戴”。

“进学”，是指升到比学塾高一级的“县学”里求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初中、高中。塾生进到县学，就称为“童生”。但进“县学”要受严格的限制，因为县学的文童生名额，是按本县每年上交政府赋税数额多少来定员的。瑞安县学名额在北宋崇宁元年（1102）起一直只有16名。在塾学学过的学童要经过县令等官员的考试后，成绩最优秀的才能进县学，叫“进学”。一但进了县学，就会得到政府每月六斗米（或四两银子）的补助，亦称“廪”（国家粮库）生。到清朝康熙六十一年（1722），由于瑞安县人口增加，赋税额也增多了，加上清廷对教育的重视，瑞安县学廪生名额才增至20名，再增加20名“增生”和12名武童生。“增生”可以“进学”，但没有享受补助廪生的待遇，要经过每年的科考、岁考，成绩优秀的才能补充到廪生的行列中去。所以叫“补廪”。廪生每两年通过考试选拔，优秀者可以进朝

廷办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里求学，叫“贡生”“国子监生”。国子监生又分外舍生、内舍生、上舍生三等。上舍生又称“监生”“释褐”（脱去百姓服装），取得相当于“举人”的资格。这时的太学生帽子又可以换成包头巾式的幞头了（幞头是宋代学子的帽式，宋末，上舍法也废除了）。所以说，“读书、戴顶、进学、补廪”，是古代学子上进的阶梯，被人编成口头禅。

一对一上课，叔侄坐一堂

一堂一所全县唯一的县学，自北宋崇宁到清初康熙的六百多年时间内，文童生一直只有16个人坐在讲堂里上课，私家办的私塾，庠、序等学子最多也不过数十人，比现在学校的“小小班”人数还少，而且教材又不相同（因学童进校时间不统一），怎么学呢？是像现在家庭教师的“一对一”式地上课，其他学员在讲堂里自己复习，老师一堂中只叫几名学童。听到的一个人站在老师座位旁边，拿出书（先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老师按顺序一篇篇地点课，教读生字、讲意义。前两书基本上三字一句，不用标点也能读，但《千字文》的课本，是没有标点断句的，就在老师点课时，边教边在学生课本上用红朱笔画圈圈断句，让学生照着圈圈断句读背，会背了再讲意思。这个学童教完了，再换另一个学童。所以既像现在的“一对一”，又像数十年前，两个班级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复式班”教学。

老师在讲台上有一条一尺长的木条。如果学生偷懒不会背书或问题答错了，老师就会用这条木条（名叫“板子”“戒尺”）打学生的手心。学生最怕这个“板子”。听说

民国时期，瑞安县城有位名师，讲台桌上还放着它，但很少见老师用它，有次真的有个学生调皮又偷懒，老师生气了，叫他来打手心，这名学童伸出手后，见老师咬着牙，瞪着眼，高举起板子，这名学童吓得扭过头不敢看，过了一会儿，觉得手心有一下痒，回头看，原来老师板子举得高，打下去像抚摸一样，很轻，从此再不调皮了，他知道老师很爱他，说打手心，只是做样子吓唬他。这件事一直成为这位老师的“佳话”，那一代瑞安人中很多都听过。

教室中不同程度的学童都坐在一起，私塾又往往是一个姓家族的学童来读书的，有些老学童当叔叔的也与侄子们坐在一起读书，都称呼“书友”，甚至当老师的辈分比学童低，但是在讲堂里就不比在祠堂了，不讲辈分，只认师生。当“老师”的侄子比“叔叔”大（按“天地君亲师为大”的古训），叔叔也要给侄子叩头呢。例如：林垵的金家，叔叔金蝶轩是环川书塾（后为勤业学堂）的学童，侄子金鸣昌是秀才当塾师，叔叔就要听侄子的教导。

报喜队·书包

过去，县府学、贡院均有一支“编外”的报喜队，专门给考中秀才、贡生、举人、进士等学子的家庭送喜报，好像现在给高考生送《录取通知书》的邮递员（但邮递员不能收红包）那样。

报喜队用大红纸写上：某某人高中什么科目、第几名等字样，敲锣打鼓送到考中的学子家中，以赚取“劳务费”（《儒林外史·范进中举》就写到此事），然后把红纸贴在得中者上间（中堂）的板壁上。如今，个别山区老屋可能还会留着。这样类似

的情况，到民国时还在延续。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定的《癸卯学制》规定，小学分初等小学堂，学制四年，高等小学堂，学制两年。那时初等小学毕业生，在农村也算学子了。毕业时学校也发“文凭”（毕业证书），就有报喜队把红榜送到家中张贴，高小毕业、初中、高中毕业生，在一乡一镇，也都是比较稀罕的，报喜队都会抓住机会送喜报赚“利市钱”（现在叫红包）。

学童们上学要带书本、文具，现在的学生把书本、文具装在书包里随身背着，但在清朝时，在私塾读书的学子，书、文具是放在“考篮儿”（七八寸长，五六寸阔，四寸高，四角稍圆，上面有盖的竹编）里。当然，“考篮儿”也有等级，竹条细，里面有屉，外面加油漆，当然更精致了。民国时，都用青蓝粗布，人工缝成袋子，再缝上带子，斜背在身上，也算顶神气的。后来洋布进口多了，买一块两尺多见方鲜青、鲜灰色洋布，一个角缝上一尺多长的带子，带子另一端系着一枚铜钱，用来包书，平时一只手捧着上学，算是很新式的。改革开放后流行双肩包，每学期外婆、舅父都要给换新的，父老们看见，总会啧啧赞叹：“当今的学堂生命真好。”

往日的学子如果到县学里进学，一般用“书箠”装衣服，文具（长尺五，阔一尺多，高两尺许，竹编的，旁边有棕绳，可与铺盖成一担），自己或家人挑进城去。而现在，上中学、大学的青年学子，推着装有四个小轮子的漂亮行李箱，肩负家庭和国家的重任，乘飞机或坐动车、汽车到学校读书，过去的状元骑马，怎么能比得上？有位老人说得好：“这就叫新时代浪漫的幸福！”

『朱岙底，朱岙底，扫帚卖了办彩礼』

■虞秋生

马屿『扫帚村』探秘

“四面姜黄三面竹，山色罩村幽溪流。”这是一位外地客商留给马屿镇朱岙底村（现称祥瑞村）的一副对子。

朱岙底三面环山，一面挨着国道322线，村四周散种着姜黄（别名温郁金，一种中药材），毛竹林从东、南、西三面包围着村庄，一条小溪从村后马头山竹林中逶迤而出，自西向东穿村而过，奔飞云江而去。溪桥旁的榕树下，几个村民围着象棋棋局轻声讨论着，还有几个村民坐在铁椅上，扇着蒲扇，聊着天，很是悠然自得。移步村中，但见男男女女忙着分拣金丝草、捆小把、扎扫帚，有条不紊，各司其职。这里没有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宁静。

始为挣小钱 终成一产业

朱岙底村现有居民206户，计706人。余姓与潘姓在村里占多数，族谱记载，他们在300年前分别由乐清柳市和瓯海藤桥迁徙而来。

小山村突出特点是“一少”“一多”。耕地少，全村共有耕地140亩，人均耕地0.17亩；毛竹多，村里有毛竹林600亩。村里先辈们靠山吃山，在砍竹挖笋换钱的同时，还利用“毛竹茜”扎扫帚。始于清末民初，村民把毛竹茜留下晒干，用双脚搓掉干叶，砍来村东山脚的金竹，扎成扫帚，拿到马屿和清垵集市上出售，挣点小钱，贴补家用。由于村民缺乏商品意识，加上有个阶段对商品流通管理严格，以致近70年了，朱岙底村扫帚生产一直处于就地取材、偷偷摸摸捆扎、数量小、品种单一、仅在附近售卖的状况。这是朱岙底村扫帚产业萌芽起步阶段。

1978年至2006年，朱岙底扫帚产业进入“改革开放，自我发展”阶段。村民看



村民在扎扫帚



朱岙底村马头山600亩毛竹林

到了扫帚市场的广阔前景，纷纷加入扫帚制造行列，以家庭为单元的扫帚作坊呈井喷之势。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从业人员快速增加，产量产值明显提升。全村约有50%的村民参与其中，年产扫帚50万把左右，产值达700万元。

第三阶段是2007年至今。“合作社形式，规模化发展”阶段。在政府“特色经济，一村一品”和“三位一体新农合”政策推动下，2006年7月10日，村里成立了马屿朱岙底扫帚专业合作社，本村31个扫帚专业户加入了合作社，扫帚制作大户余贤安任社长。第二年，合作社争取到了800万元低息贷款。有了财力支撑，扫帚生产如虎添翼，规模产量迅猛扩大。合作社外加11家散户，当年产量由50万把上升至75万把，产值由600万元增至900万元，纯利润达260万元。此后，产量、产值和利润稳步上升，到2019年，产量突破100万把，产值达1500万元，纯利润450万元。扫帚专业村声名鹊起，先后成为瑞安、温州“一村一品特色经济”的先进典型。即使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朱岙底村扫帚产业仍然逆势飘红。目前，村里扫帚从业人员约100人。一个合作社统筹、专业户经营，村民在家上下班、忙闲由己定的产业模式已然形成。

产业要发展 须把四道关

一般人认为，扫帚产业生产组织简单，技术要求不高，市场基本稳定，是个“好弄”的产业。实际并非如此。朱岙底村扫帚产业之所以久盛不衰，与他们严把四道关有关。

第一关是精挑选选原材料。一把扫帚由3种材料组成：竹料（金竹与毛竹茜）、金丝草和线绳。线绳随处可买，选质优的即可。竹料与金丝草则需要到外地采购。通常，每年10月份开始备料。原来，因人工费用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村民不再采本村后山竹料，而是到外地采购。2000年前，基本上在文成县东坑购买，2000年后，

在平阳县青街镇选购。一般是电话预订，现场看货，再租车拉回。都是长期合作的伙伴，质量可靠，交易放心。

金竹是扫帚把的首选材料，有1.1米和0.9米两种规格，比较好选。而毛竹茜是扎扫街扫帚的，韧劲要好，0.5米的长度最佳。家庭、工厂用的扫帚，原料是金丝草（又名地肤草、蓬头草、孔雀松），要求株丛紧密，株形呈卵圆或圆珠形，分枝多而细，短柔毛，茎基部半木质化。江西省九江市生产的金丝草价格合理，质量好，是重点采购地。从前，生产户各采各的，合作社成立后，每年10月由合作社派人到原产地看货订货，采购量一般在200万吨左右，租车拉回来。原材料一般堆放在村民房內或露天开阔地。露天堆放的，草垛底部要用木料垫高，留好透气、排水通道。为防止雨淋和暴晒，堆场顶部与四面要用厚塑料布覆盖。5月份是潮湿霉变期，天气放晴时，要揭开塑料晾晒，以保持材料干燥。

第二关是认真扎好每小捆。这是保证扫帚质量的重要一环，此活一般由老年人或妇女担当。捆扎时，要把霉变的、长度不够的材料挑拣出去。重量控制也很要紧，扫大街的扫把，每小捆重量为半斤，家用的每小捆为3两。捆扎时，用力均匀，以紧实为标准。

第三关是扎扫帚，这是整个工序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扫帚生产中最费力气、最具技术含量的一个步骤，一般由技术娴熟的青壮年担纲。一根1米或0.8米的金竹棍，一根长布条或一节金丝绳，5小捆观音草或毛竹茜，把布条或绳子一头固定在柱子上，人弓腰，双手紧握竹棍，紧拉布条或线绳，把5小捆观音草或毛竹茜逐捆紧紧地固定在竹棍上。捆扎时，一要用力，务必使竹棍与观音草或毛竹茜捆扎紧实；二要使扫帚下方整齐美观，以达到既好用又漂亮的目的。因为费力，又有外形讲究，一把扫帚捆扎需要6至8分钟。一个熟练工人，一天8小时，大约能扎60至80把，技术相当好的可以扎100把。

第四关是销售。这是保证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产品生产的最终目的。村里每个专业户都有固定客户，这是多年经营形成的。村里扫帚销售市场主要在温州境内，以瑞安、龙港、文成和瓯海为主。城市环卫工人扫大街用的毛竹茜扫帚价位高，一把在16至18元之间，家庭或厂用的金丝草扫帚是14至16元一把。目前金丝草扫帚约占市场份额的70%。送货时，双方一般都有约定，先打个电话，确定买卖数量，然后按量送达。村里一般售卖给日杂土产店，再由他们卖给用户。

朱岙底生产扫帚，目前大部分采用人工制作方法。村民告诉笔者，扫帚生产可以用机器替代，只是购买机器要花钱，要建厂房占场地，捆扎速度跟人工差不多，质量有时不够稳定。而人工制作，不仅节省生产成本，也能保证产品质量。

家家致富忙 村风成榜样

探访朱岙底村，笔者发现该村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是村文化礼堂没有人搓麻将、打扑克。人去哪里了？村民说，家家户户忙于挣钱，谁还有空玩呀。扎扫把的，个顶个在干活；其他人大多都在外地开店卖熟食和眼镜。扎扫帚虽然挣得不算多，每把扫帚去掉成本，大约有6至7元的利润，两个人工作一天，可以挣到300元至500元，只要肯花力气，坚持生产，就会富起来。所以，没有人会把时间浪费在玩乐上。朱岙底村长期形成的好村风，也成了周围村庄学习仿效的榜样。

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这个村的人喜欢到瑞安城区与马屿镇街上买房。据村民介绍，目前，村里在瑞安城区购了房的有10户，在马屿镇街买房的有20户。全村有100多户在村里盖了新房。那么多人盖房买房，自然有扫帚的功劳，是它鼓起了村民的腰包，带村民奔小康。村里有两句顺口溜可以佐证：“朱岙底，朱岙底，扫帚卖了办彩礼”；“老人是个宝，天天扎扫把（扫帚），钞票给挣倒，养家又养老。”



朱岙底村一角